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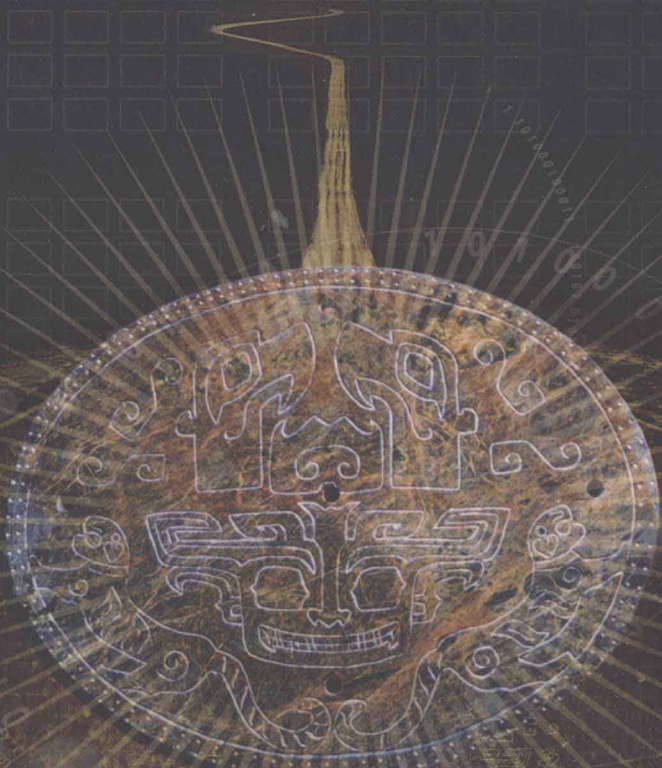
S H E N M I D E S A N X I N G D U I

# 神秘的三星堆

S H E N M I D E S A N X I N G D U I

——寻找古蜀文明

XUNZHAO GUSHU WENMING



LIUSHAOQONG·ZHU 刘少匆/著 KUNLUNCHUBANSHE

昆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神秘的三星堆—寻找古蜀文明/刘少匆著.-北京:昆仑出版社,2003.8

ISBN 7-80040-700-4

I. 神… II. 刘… III. 巴蜀文化-研究 IV. K878.0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71697 号

书 名: 神秘的三星堆——寻找古蜀文明

---

作 者: 刘少匆

责任编辑: 王大亮

装帧设计: 赵光明

责任校对: 刘晓京 祁 东

出版发行: 昆仑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8 号 邮 编: 100081

电 话: 62183683

<http://www.jfjwyph.com>

E-mail: jfjwycbs@public.bta.net.cn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三河文化局灵山红旗印刷厂

开 本: 850×1168 1/32

字 数: 170 千字

印 张: 7.5

印 数: 1—5000

版 次: 2003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3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040-700-4/G·131

定 价: 13.00 元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# 目 录

- 开场白/1
- 隐藏在沃土下的历史/5
- 蜀人来源遐想/22
- 从蜀山氏到蚕丛氏/37
- 柏灌钩沉与鱼鳧失国/54
- 三星堆的主人——杜宇王朝/64
- 三星古城的谜团/77
- 杜鹃啼血与开明治水/86
- 开明王朝与蜀文化的消失/96
- 蜀人的最后辉煌——李冰治水/104
- 青铜世界之一/113
- 青铜世界之二/127

青铜世界之三/142
青铜世界之四/155
隔行说玉/162
民间古蜀玉石器小议/170
金器和陶器/181
古蜀国的刻画符号与文字/193
古蜀国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/202
海贝与古蜀的交通/214
三星堆与长江文明/217
研究与炒作/226
煞尾/235

## 开 场 白

我的家乡四川广汉，虽是成都平原北部一个小小的县级市，在川西坝上，倒也颇有名气。汉武帝元封五年（公元前106年）划全国为13州，整个西南为益州，下辖汉中、巴、蜀、广汉、犍为、越西、牂牁、益州八郡。而当时益州刺史治雒县即广汉，蜀郡守才治成都，可见这地方很有点来头。以后从东汉安帝元初至唐朝，这里都是郡、州的治所。直到康熙二十六年（公元1687年）才降为单州，不再辖县，其位置早被后来居上的成都所替代。

作为西南政治经济的一个重要据点，广汉也曾有过辉煌。早在汉代，广汉就是金、银、错、漆、刀等物品的重要产地，所谓“雕镂扣器，百伎千工”（杨雄《蜀都赋》），“其蜀（广）汉扣器，九带佩刀，并不复调”（《后汉书·邓皇后纪》）。因此，专门在这里设立“工官”。而文化方面，有严君平卜卦之台，翟辅天文之学。唐代房琯贬任汉州刺史，许多文人墨客云集雒城，着实让这里热闹多时。宋代的大儒程颐、程颢随父程珦，在广汉讲学，使莘莘学子，开了眼界……但是，这里的文化史，仿佛仅兴于秦汉之际，关于古代蜀事，唯一的，只有



广汉文庙前的根星门及其“八骏图”浮雕

一条记载，说蜀侯恽被杀平反后，城北曾建蜀侯祠供人祭祀，但这已是秦灭蜀以后的事了。而什么“鱼鳧得道”、“杜鹃啼血”、“五丁开山”等传说，则是彭县、郫县、梓潼等地的“土产”，与我们广汉人无干。但事实却并非如此，透过重重的历史迷雾，人们终于发现，广汉这块土地上，在遥远的上古时代，曾经上演过许多可歌可泣的历史大剧。而剧中的情节、人物，甚至服装、道具都让我们惊愕万分，以至在 21 世纪的今天，我们对其中许许多多的人和事还深感不可思议。我们也许

会扪心自问：对过去，对未来，甚至对现在，我们到底知道多少？从无知到理解，这条道路十分漫长，千万不可妄自尊大。学海无涯，知识无涯，真理永远与我们有距离。我们唯一能做的，就是不断发现、探索。能走近事实和真理，渐离假象和荒谬，我们就应该备感幸福。

许多年来，广汉似乎并没有震惊天下的重大发现。翻阅古史，《南齐书·始兴简王鉴传》有“广汉什邡民段祚以镗于献鉴，古礼器也，高三尺六寸六分，围二尺四寸，环如筒，铜色黑如漆，甚薄，上有铜马，以绳贯焉”。倒像建国后出土（涪陵小田溪2号墓，1972年）的虎钮镗于。又据故宫博物院专家周南泉先生介绍，四川的蜀玉，早在明清时代，已为皇家收藏，不过并不知是古蜀遗物，还以为是秦汉古玉呢！

三星堆暮色



广汉地区，许多年来，民间常有古物出现，但从未引起广泛关注。譬如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的1972年冬，在离今三星堆不远的新平土城村，曾发现船棺3具。两具直径为1米多，长3米余；一具直径50厘米，长约4米，均系乌木挖制。其中有完好的青铜器约5公斤，卖给了废品收购站，最后只有一柄铜剑，上交省博物馆。至于棺木，则被生产队解为仓板。以今日眼光看，这当然应是古蜀国的晚期墓葬，但当时，四川已有多处船棺墓发现，又由于处于“文革”中期，也就不可能引起考古界的注意。

所以，科学地寻找古蜀文明，得从真武村燕家院子说起。



## 隐藏在沃土下的历史

今日的广汉市南兴镇三星村，早年属太平场真武村。在真武庙的左侧有一座不大的农家院落，户主就是燕道诚。

燕家并非土生土长的广汉人，他们原籍金堂。燕道诚的祖

今日之燕家院子





1929年燕道  
诚全家像

父，是位算命兼看阴阳的先生。他认为离真武庙不远的一座旧牛车棚，是块风水宝地，就在此定居下来，并置了点田地，让儿孙们耕读为生。孙子燕道诚，聪慧好学，有了功名，就团馆教学。37岁时，还到外地当了三年县知事，不知是什么原因，40岁时就回家赋闲，杏坛执教了。

燕道诚的学生陶凯（字松柏），原是混成旅的团长，曾兼任广汉县知事，不免时常邀请老师到县上参加各种应酬。燕家距县城不过15里，燕道诚也乐得有吃喝和娱乐之所，就把田地交次子燕青宝经管。后来，陶凯任混成旅旅长，仍驻防广汉，作为学生的座上宾，燕道诚也算县上一位名流。

1929年早春的一个下午，正抽蔓的油菜，需要灌水。燕青宝在住房旁的竹林边，紧靠水沟，选了一处地势稍低的地方，挖一个坑——即所谓“龙窝”，以便架水车车水。谁知几锄头下去，竟发现了一个土窖，窖里有许多他从来也没有见过的玉石器。燕青宝虽然文化不高，也知这是宝物，就急忙将它

用土埋好。70多年前，农村里的院落，比现在稀疏得多。虽鸡犬之声相闻，除了红白喜事，少有往来，不像现在天天聚在一起打麻将，喝闲茶。燕青宝不需为走漏消息担心，何况，这件事就发生在自家的院子旁。

傍晚，燕道诚酒醉饭饱，拄着拐杖从城里回来，燕青宝向父亲禀报了此事。燕道诚自然十分兴奋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就亲自率领全家老小，把竹林边的土坑重新挖开，取出坑中的玉石器搬到自己的堂屋里仔细清点，共有璋、钏、珠、刀、斧及玉料等，据说近400件。那坑底，还有一个用石板盖着的小石槽，里面装着五个精美的玉琮（今天，陈列在故宫博物院里的，就是其中之一）。这个小石槽，至今还在燕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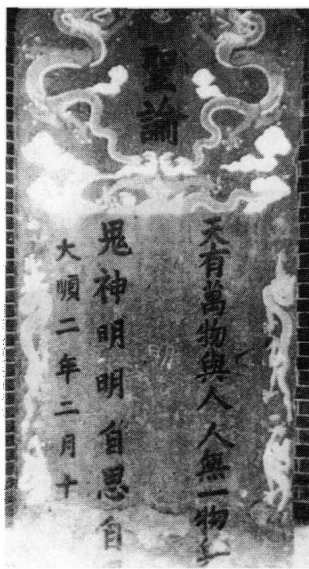
燕道诚虽然不懂金石学，但见多识广，也知这是一批古器，但家里有吃有穿，因此，没有打算变卖，觉得拿来鉴赏清玩，倒符合自己的兴趣。加之汉晋以来，人们追求的是和田玉质，坑中的玉石器上等的也属杂玉，卖不了多少钱。所以，就

1929年出土的玉琮



心安理得留了下来。只是一些朋友到乡下拜望他时，兴致所至，不免拿出几件，让大家欣赏，增加一些谈资。若有朋友索要，也就馈赠几件，因为他也并不了解这些器物的历史价值。

事情总是有些凑巧。原来在三台县圣公会传教的牧师董笃宜 (V.H.Donnithorne)，因升任圣公会川西教区总会副吏总，于1930年转到广汉，与夫人一起，管理教务。董牧师20世纪20年代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哲学系。那时，欧洲的考古学家，在全世界异常活跃，成绩卓著。来中国的瑞典地质学家史特生、英国人斯坦因等等，就是我们不会忘记的名字。董笃宜也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，对考古情有独钟，传教之余，总爱打听当地的逸闻旧事。他到广汉不久，就在北外一户教友家的猪圈里，发现了一块有字的石碑。经他劝说，教友将石碑移出洗净，原来是张献忠建立大西国，于大顺二年（公元1645年）



董笃宜牧师发现的“圣谕”碑

颁发圣谕时所刻的“圣谕碑”。古碑正面上方刻“圣谕”二字，其旁有“天有万物与人，人无一物与天；鬼神明明，自思自量。大顺二年二月十三日”的碑文。碑阴为南明将军杨展于隆武二年（公元1646年）所刻的《万人坟碑记》。这块重要的石碑，至今仍安放在广汉市的房湖公园内。

也许正是圣谕碑引起了他对本地古物的兴趣，当他在太平场一带传教，听到燕家发现古物时，决定深入了解此事。后来，他写道：“1931年春，我听到当地群众议论：离该地不远，发掘出石刀和石璧。后来又获知，农民挖水洞时，又出现许多器物，可是都分送给了乡邻和戚友。

“作为一个外国人出面获得这批散失在私人手中的器物，是不妥当的，理应通过当地县官办理。为此我催促陶旅长出面，做必要的宣传，尽快寻回散失器物，以便把它们保存下来。当时陶旅长表示同意，如果可能的话，他会带来几件石器。”

原来，这位陶旅长既是燕道诚的学生，又是一位基督教徒，事情很快就办妥了。“没过几天，他拿来五件石器（现藏华西大学博物馆），陶旅长说：这批器物是一位富农造田所发现。据他本人讲，他不愿意卖给我（指董牧师——引者注）或其他人。他现在借给陶旅长，此后是要退还的。陶旅长要我短期保留。”

“次日，我乘车返蓉，交给戴谦和（D.S.Dye）保管。几天后，我遇见陶氏就向他请求，尽量能为博物馆收集这类器物。不久他与燕氏带来了他在田里发现的几块石器，后者（指燕道诚——引者注）对此即产生了疑惑，不知我要这批石器有何用途。陶氏也对这次发现引起了极大兴趣，并想把采集到的石器保存在博物馆里。此后，燕先生把自己的几件石器送给陶旅

长，他（陶旅长）作为礼物又送给博物馆保存。”（引自 [美] 葛维汉《广汉发掘简报》）

原来，这位戴谦和先生是美国的传教士，地质学家，也是华西协和大学古物博物馆的负责人（该馆从 1919 年就开始征集古物，至 20 世纪 30 年代，达到 15885 件。计有旧、新石器时代石器，殷商、周青铜器，古今玉器，汉代陶俑，明清服饰以及西藏神像及其他物品等）。董笃宜交给他鉴赏的东西，当然让他喜出望外。因此，他专程来到广汉，由董笃宜、陶凯陪同到太平场燕家的发掘处，进行过实地考察。燕道诚还向华西大学博物馆两次赠送四件玉器。

这些古玉石器，引起了在华大博物馆工作的美籍加拿大考古学家葛维汉的注意，并希望获得更多信息。于是，在 1933 年致函董笃宜。经过相互通信，为了找到更多的类似器物，以鉴定它的年代和族属，打算获得当地政府批准，前往该遗址进行发掘。

1934 年 3 月 1 日，葛维汉来到广汉。令他吃惊的是，遗址附近的群众已经为寻宝而乱挖乱掘。葛维汉到县政府，向县长罗乃璠说明情况。罗县长当即表示，若不作科学发掘，古遗址会遭受不可弥补的损失。他立即发布告示，禁止私人发掘。同时，以县政府的名义向四川省教育厅申请发掘执照，然后邀请葛维汉从速开始发掘工作。罗县长亲自主持发掘事宜，而发掘方法则由葛维汉负责指导。

手续很快办妥，3 月 15 日，葛维汉再次来广汉。晚上，在董牧师家做客，请来罗县长共商发掘的具体方案。第二天一早，县政府派来两名官员，与董、葛两人一起，来到燕家。燕道诚设宴招待。然后，把葛、董等人安排到真武庙的清静禅院内。为了保证安全，陶旅长和罗县长还派了 80 名士兵警戒守



1934年参加发掘的工作人员合影

护。后来，华西大学古物博物馆的林名均也参加了发掘工作，并协助负责发掘工作的部分任务。

这是三星堆遗址第一次科学发掘，使用了测量水准器、平板仪、洋铲、中外锄头、泥刀、钝刀、竹棍、竹签、标杆、耙锄、软硬刷子、钢卷尺、测量竿、大块琥珀、绘图的指南针、柯达相机等。“旨在更清楚地了解地层关系，准确记载每件珍贵器物的方位和深度，保存这次发掘充实而详细的记录，以便能更多地提示出当地的历史和重现那些埋藏的文化。”这与今天的发掘现场，也相差无几。

这次一共发掘了四处，得到有价值的文物 600 来件，最后把出土的器物全部送到县政府，请罗县长和当地政要过目。罗县长最后说：“这些器物，很有科学价值，把它们全部送给华西大学古物博物馆。”后来还在广汉公园宴请了葛维汉、董笃



1934年发掘现场

宜等参加发掘的客人。

对这些器物，葛维汉和林名均先生，还邀请了华西大学地质学家、原博物馆馆长戴谦和，华西大学化学家柯利尔（H.B. Collier），成都加拿大大学校长、美术家黄思礼（L.C. Walsley）等进行研究，得出了大约是公元前 1000 多年的遗物的结论。这与我们今天的看法，也大致相同。

中国的考古发掘工作，正式开始于 20 世纪 20 年代。1921 年，瑞典人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遗址；1927 年，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共同发掘北京周口店的旧石器时代遗址；1929 年，



裴文中在该遗址发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；1928年，李济和梁思永开始发掘殷墟遗址；1928年，吴金鼎发现龙山文化遗址；1931年后，梁思永发掘安阳后冈遗址……于是，黄河文明的基本轮廓，初步显现。1934年三星堆遗址的第一次科学发掘，是长江文明科学考古的先驱，应当大书特书。

这次的发掘成果，曾引起广泛注意。安特生说，广汉和河南仰韶的收藏器极相似，只是没有彩陶。这说明古蜀与夏确有渊源关系。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郑德坤把这里出土的文物命名为“广汉文化”。这件事也引起了远在日本的郭沫若先生的兴趣。他去信华大博物馆，索要广汉发掘的全部照片和器物图形。后来他回信林名均：“我十分高兴收到你与葛维汉先生的来信，你们真可谓是华西科学考古的开拓者……我深感遗憾的是不能回国，协助你们参加发掘。……你们判断为周代早期的文物，也许是可靠的。现在，我只能说这么多。有朝一日，四川别处会有新的发现，将展现这个文化分布的广阔范围。并且肯定会出现更可靠的证据。”

葛维汉发表的《广汉发掘简报》最后说：“笔者对董笃宜牧师致以深切的感谢和真挚的谢意，这次发掘工作如果没有他的大力协助是不可能完成的。广汉罗县长也提供了充分的保护，分担了发掘费用，并且最后把全部文物送至华西协和大学古物博物馆，为中国人民永久地保存起来。”

有报刊披露，说葛维汉离开中国时曾盗走不少文物。据《成都市志·公安志》载，美侨白天宝在1949年2月至1950年7月任华西大学古物博物馆馆长期间，曾多次盗走馆内藏品，用路德会包用的专机运往美国。又将馆藏历代文物拓片百余套，偷偷卖给美国哈佛燕京学术社和英国皇家博物馆，还将北京图书馆寄存的三箱文物打开行盗。经公安机关查实，于